

《温州通史》已经开始编纂了,这是我市为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启动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。全书计划分8卷,即导论、先秦、两汉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、明、清、民国,每卷约30万至60万字,共计350万字。完成此项工程计划用6年时间。与之相配套,还分门别类编撰专题史,目前已有人口史、移民史、华侨史、戏曲史、方言史、商业史、民俗史等30个,每个专题约5万至10万字。目前,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学者参与此项计划,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张侃便是其中之一。

我与张侃,是在市图书馆的一个偶尔机会经介绍才认识的。他个子不高,方方正正的脸,穿着休闲西服,看上去很是温尔文雅的,颇有年富力强学者的风度。交谈中,还有点腼腆,话语不多,称自己正带学生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。

在《温州通史》的编纂中,他承担的课题为“温州沿海平原的家族与社会”,这是个大题目,涉及的面广,并且非下田野调查的苦功不可。不过,这也是他的学术专长之一。他的学问是在田野调查中积累的,这也正是不少学人所缺乏的。那天,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观察经济的文化动因

金:编纂《温州通史》是温州地方文化的重大事件,作为学者参与其中是人生难得机遇,特别是为家乡。您承担的“温州沿海平原的家族与社会”专题项目,内容广阔,很有区域文化特点。您怎么会想到选择此课题的,是否与您成长在多世家大族的区域有关?其研究价值是什么?

张:我的童年时代恰是从“文革”结束到改革开放,目睹了传统文化在永嘉场(永强)的复兴。家族观念较强的永嘉场,大家族基本都重新编谱,圆谱成为地方性盛事,使我对家族有了感性认识。后来离开永强到厦门读书、教书,闽南地区文化形态与温州有相似之处,这促使我拉近距离,对比闽南人、晋江模式与温州人、温州模式。其实,这两个大变革时代的醒目标注,褒贬也不一致。尤其是温州经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,作为温州人,被人追问,也常常自问,温州人是经济动物吗?其实,我不接受“是”这个答案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的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”告诉我们,必须观察经济的文化动因。学界也曾分析温州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,不过以宋代“永嘉学派”的事功之说居多,可能会遮蔽元、明、清、民国乃至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创造机制,也往往导致忽视文化传承。这个问题不孤立,近年来,我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考察,这种感受也很强烈。那么,我们是否存在在文化重建机制呢?于是我把这个问题带回温州,希望对此有所回应。

2005年,我带牛津大学、香港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一批老师,考察温州地域文化,他们认为温州值得深入分析,并鼓励我转移学术重心。由此我开展了永嘉场研究,收集、整理资料,撰写了一些文章。也曾帮助龙湾区筹办召开明代浙南地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。除了编辑出版了《晋门张氏家族文献综录》,现已完成《张振夔集》和《鹤泉集》两部文献的校注,正在进行后期清定。我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,可以完成专题研究任务的。

金:从社会发展来看,中国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,东部一直处于先进发达地区。温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,特别是沿海平原同样在温州地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不知您研究的重点是什么?目前进展是否顺利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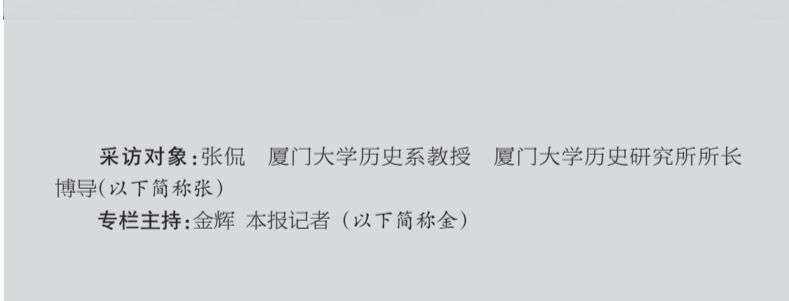
张:这个问题不能线性或平面地进行讨论。所谓的“不平衡”,是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节奏及实践过程的描述,它本身是历史过程的差异性的客观体现。我先说明,课题以“沿海平原”为区域,不是认为温州山区就是落后区域。因此不存在“发达”和“不发达”的先验判断,“不发达”也有“不发达”的理由,两者并不能互相取代。当然,温州人口语里,有“乡下人”、“山头人”的偏见,目前还有“外地人”的另类眼光,这种身份区分造成的,也是一种政治。作为学者,尽量避开“优越”之说,今天发生的,以前也存在,回顾历史,我希望从关注不同家族类型的产生机制及其动态过程入手,从民间角度,以人为本讨论社会转型与时代特征。温州地区大部分存世文献为宋明之后的资料,我把研究重点定为宋明以后的变迁过程。现在经过资料整理和分析,大致有了家族历史演变的框架,提炼了变化节点及其类型。不过,沿海平原原因生态、人群、生计等差异,庶民的文化创造力极强,家族形态复杂,远远超出了原设想,这是研究的极大挑战,一方面需要阅读大量文献,观察各种形态的家族,另一方面要予以提升,给予总结归纳。我正与几位博士研究生一起努力,希望达到此学术目标。



游学



张侃2013年初夏于温州市图书馆 陈莉莉/摄



张侃,1972年2月19日出生在温州永嘉永中(今属龙湾区),1983年小学毕业于永强小学(今永中街道第二小学),1986年在永中镇中学完成初中学业。1989年毕业于瓯海中学,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,1996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。其间,1998年晋升讲师;2002年破格为副教授;2008年以副教授破格遴选为博士生导师,同年评为教授。1997年在任职读历史学博士学位,2001年获博士学位。2004年-2012年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。2005年-2007年,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,2008年-2009年为哈佛-燕京学社访问学者,2010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,2012年-2013年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。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历史研究所所长;中山大学-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。

张侃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,东南区域文化史,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项、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。曾在《学术月刊》、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、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。所参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、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、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、厦门大学2007年度教学名师。他还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人才。

以民间立场认识事实

金:哦,说得在理。您的课题围绕着宋明以来温州沿海平原的家族与社会展开研究,那一定要采集大量的家族发展史,要深入田野调查,目前有否发现给你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温州大家族的标本吗?

张:我小时候在永嘉场三都普门生活,因父母在永强中学校办厂(现“张瑞祠堂”)工作过,对普门张氏有直接的认识。前几年进行张瑞的若干问题研究,与地方文史学者张卫中一起整理《普门张氏家族文献综录》,普门张氏的历史过程最为深刻。不过,这两年我带着学生到处走,比如瓯海、永嘉、乐清、龙湾、洞头等地都有一些考察,也有了一些比较。永嘉场的考察范围也有铺开,比如高原张氏、环川王氏、李浦王氏、英桥王氏等,涉及房支、族产、礼仪、婚姻、教育、文化建设等,对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多认识。不过,我不认为找到典型大家族,就有惊天大发现。如果我们关注普通庶民、关注民间动力,这不是认识的终点,而只是起点,它为考察历史提供一个切入。因此,我们不仅要分析这些大家族的存在与演变,还要尽可能地去寻找那些无声的历史。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个人、每个家族都会是一个美丽故事,只要能进入历史情境,就可以找出他们的喜怒哀乐,他们的家国情怀,才明白什么是草根社会。

金:旧时学术片面强调书本是学问的唯一来源,熟悉书本的就是有学问,那是“读书致知”。现代学术要求研究者不仅要“读书致知”,也要“格物致知”,从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,因而田野调查就成了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基本功。您很注重田野调查,也很有收获,能谈谈其中的甘与苦吗?

张:“读书致知”这句话没有错,但只是一个门径。新史学气象也非闭门读书,傅斯年为史语所立训:“上穷黄泉下穷碧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;顾颉刚开民俗与古史相勘之风。“书斋里的革命”,是当下读书人臆想和偏执而已,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偷懒。当然,我不能苛求所有的学问都必须走向田野,有些学问在书斋里是可以完成的,但要注意的,是在书斋里读书,不能忘记“走向民间”的情怀。

我跟随老师进行田野调查,到自己带学生进行田野调查,已经历了十多年时间,自始至终处于“生命的愉悦”之中。从知识积累讲,田野调查直接面对民众生活和百姓常识,完全不同于书本知识,它们是活态的,比如在古籍中读“朱子家礼”,无法感知祭祀安排,如果到了一个宗族的祠堂,特定空间很清晰地把知识立体化了。再如仪式,地方志记了一堆“唱”、“赞”之礼,读者往往不知所云,如果看过一次祭祖现场,礼生、道士拿着疏文唱赞,大家就会有“礼失诸野”的感触了。田野更重要的内容是思维改造,现代教育是不接地气的,因此对社会认识常常形成误区。田野中所认识的实践,与书本差异甚大,或者完全相反,那么,迫使我必须放下学者身段,换位思考,站在民间立场去认识事实逻辑,这是陈寅恪所说的“了解之同情”。

兴趣决定我的命运

金:历史和现实密不可分,读史能够使人明智。您对文史的兴趣是否从小就培养的?在家乡读书时是否就喜欢上文史?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吗?

张:因父亲为中学教师,家中有藏书,我从小喜欢看各类书,相对同龄人而言,接触文史知识早一些。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外婆,她是清光绪年间温州府学朱眉山的孙女,曾在杭州读书,后回温州,曾就职于籀园图书馆(现温州市图书馆),帮助孙延钊做过事。她给我讲各种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、历史传奇。家庭熏陶,使我不知不觉地与文史有了亲密接触。高中进入瓯海中学,我的理科成绩也还不错,高一数理化成绩大概都能在年级前五名。文理分科时,老师曾建议我读理科,我凭自己兴趣倾向于文科。后来在班主任绍国先生的支持下,选择了文科。兴趣决定了我的命运,高考填报志愿,三个专科选项,依次为哲学、历史、中文。这些小小选择,累积了我现在的学之道。学问有时很简单,靠缘分,凭兴趣,一份坚守而已。

金:以您的个人简介看来,您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,先后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,又在厦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,东南区域文化史,这为您搭建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平台。能告诉我您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是哪项?

张:正如你所了解,我的个人学习经历只用四个字就说完:厦门大学,学缘单一,有欠缺与不足。简单总结现有研究,从两个方面说,一是经济史研究,这与博士论文有关。厦门大学历史系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见长,是国家级重点学科,这是我依托的学术平台,因此读博士时,以“中国近代外债制度”为研究对象,做了一些工作,后来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,撰写了一系列文章。二是民间历史文献,这是我与其它同仁近年来一起探索的领域,这是温州研究的工作基础。目前除了一些实证研究之外,曾写过《田野工作、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》短文,后被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,算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些思考。

金:您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温州学人,属70后的年轻学者,不论是学术研究天地,还是年龄优势,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,成了学术中坚。可是社会上也有人认为,学术腐败在大学中时有发生,不少老师年初找课题,年终分金钱,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的?



张侃(左一)在永嘉枫林作田野调查

张:“学术中坚”这一说法,实在不敢当。作为文史学者,我一直以温州的民国先贤为标杆,那时群星闪烁:夏承焘、周予同、夏鼐、董每戡、刘节等均为一时俊秀。无论功底,还是创见,都不是我们这些70后、80后所能企及和超越的。我所能想到的,是一代人做一代事,尽量赶上前辈学人成绩。

学术腐败是一个复杂问题,主要在经济与权力上表现得多一些。你所举的“年初找课题,年终分金钱”,只是表面问题。令人担忧的是深层的学术权力腐败。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,学术圈始终是名利场的一个化身,有人也论之为“学术政治”,西方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深刻分析。学者可能不为名,也不为钱,但很容易以“学术正确”为名,为荣誉而战,为“名”不顾一切。正是钱可以少一点,名还是要一点的“名士”意识作怪,文人相轻,拉帮结派,垄断资源,层出不穷,乱象丛生。在体制内我们看得比较多的,是职称评定、人员录用、课题申报、论文发表等。这是全球性问题,西方学术体制也难以一概杜绝。权力面的学术腐败由深层因素造成,它与政治导向、道德修养有关。

金:在完成《温州通史》课题之后,还有什么新计划吗?
张:近年来我跑了不少地方,参加了不少学术活动,有得也有失,这也是我要反思之处。我现在被邀请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“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”计划,所以到厦门、香港来往忙碌走动。

新计划倒没有仔细琢磨过,沿着现有思路。一是带学生继续田野工作,整理流散在民间的历史文献;二是引导学生开展温州研究。现有4位博士生在未来3-4年内开展温州卫所、盐场、教育、地方文献的研究,希望形成规模;三是利用民间文献,从海洋看温州文化特征,从民间角度考察温州神明体系。另外,如有可能,在原处州府、台州府所辖地界进行田野工作,开展浙南地区的整体研究。



童年张侃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被访者提供。

在瓯海山门村查阅族谱

延伸阅读

田野工作、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

■张侃

从古到今,历史学最擅长于“文献”的搜集、整理和诠释。民国时期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际,傅斯年提出“史料即史学”的观点即着眼于此:第一,凡能直接研究材料,便进步。换句话说,历史的研究能直接研究材料,则会有很大的进步。第二,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,便进步;以前都是利用文献,如果能扩大更多的材料,那学问就有前途了。第三,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其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,也就是研究的工具能够采纳的学科的话,这门学问可以有更大的发展。

史学发展到今天,通过田野工作,访寻乡老,历史文献的范围已被大大拓宽。碑刻、日记、书信、契约、科仪书、族谱、账本、民谣儿歌、戏曲唱本、民间传说、签诗、宗教榜文、日用杂书等已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历史文献;雕塑、画像、庙宇、祠堂、纪念碑、坟墓、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具等物质实体也慢慢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。除此之外,戏曲表演、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日常礼仪、车马节庆等也被纳入到历史文献的范围。借助于这些历史文献,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转移研究视线,从大人物、大事件的历史走出,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;从传统的、简单化的政治史、王朝史走出,转移到大众心态、地方风俗、民间宗教、村落文化等,这无疑历史学的进步。

不过需要指出的是,田野工作对于历史文献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拓宽历史文献的范围。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,它脱胎于人类学,已成为一种学术视野,即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侧重于文化全景性的考察。历史文献是一种历史遗存,历史学家的的工作,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不同历史文献的关联上。援引田野工作到史学研究,有利于历史学家把握历史文献的整体性、系统性。田野工作以考察社区为核心,在田野中,历史学家的社会整体观往往会变得很强,既需关注社区内部在空间上的共时结构,又要追踪社区的历时变迁,同时还要观察社区内与社区外的关系,由此搜集到的各类历史文献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,而是有机的整体,这样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系统性。同时田野即历史现场,置身其中阅读文献,还能最快地感知各种文献互相依存的关系,最大限度地体验历史整体,从而更为综合地、具体地去理解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、“国家”与“社会”、“王朝制度”与“村野民俗”、“地方性知识”与“跨区域流动”等在同时空空的意义。

节选自《新华文摘》2007年,第23期